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世界史论 / 欧美 / 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

### 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

2004-10-24 文礼朋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9月16日, 点击: 1923

#### 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

#### 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

作者: [文礼朋](#)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8 15:43:55发布) 阅读772次

时间:2003年9月16日 来源:学术批评网

摘要:侯建新先生认为, 15、16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相对于13、14世纪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增长, 户均产量增加130%, 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事实上, 黑死病前夕, 由于人均农地面积减少, 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开发出来, 单位面积产量上升, 直到17世纪才被超过。但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 劳动生产率下降, 人均产出减少。黑死病之后直到16世纪初, 人口压力减轻, 人均耕地面积增加, 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抛弃, 单位面积产量下降, 但是人均产出增加, 劳动生产率回升。从1520年代开始, 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 英国再次经历过密型增长, 并在17世纪中叶陷入马尔萨斯危机。18世纪之前, 英国农业总体上尚未出现单位面积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长。

中古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相对于西欧也同样如此。但是18世纪中期以后, 由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 并向西欧、北美扩展, 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 并且遭受西方的侵略, 沦为半殖民地。为什么中英会在18世纪大分岔, 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也是国外史学界所探讨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 天津师大历史系教授侯建新先生从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角度来论述中古晚期英国社会变革的动力, 认为中古以来中英两国农民私有产权与劳动生产率发展变化的巨大差异是两国近代历史发展大分岔的基本原因, 给人以不少启发。侯先生在考察中古晚期英国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表现中, 着重考察了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为它是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重要指标与衡量标准, 也是农民交换能力增长的基础。侯先生的这种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发现, 侯先生对15、16世纪英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考察, 以及对英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间的判断, 与笔者所了解的英国经济史有很大的出入。另外, 笔者还发现侯先生在引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中亦有不少地方与作者原意有较大出入。由于侯先生的论述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其他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农业产量变动以及宏观经济变动的叙述也比较模糊, 笔者愿意借此机会对此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探讨。

#### 一、13—17世纪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动考察

侯先生一直认为, 英国15、16世纪的单个一般农户生产率比13至14世纪末令人震惊地提高了大约130%。根据侯先生在《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中的推算, 13世纪英国混合粮食(小麦、大麦和燕麦)每英亩产量10.3蒲式耳, 按每户播种面积10英亩计算, 每户年产粮食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 15、16世纪粮食单产为16蒲式耳每英亩, 播种面积为15英亩, 户均劳动生产率为则达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 大大高于中国明代中期的户均年产2173公斤与清代中叶的1941公斤。侯先生然后又以此为基础去估算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剩余商品率、商品交换率以及剩余积累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 从而找出英国率先突破到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1]最近侯先生的估算稍有差异, 他认为英国混合粮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食每英亩的产量，从13、14世纪的11.5蒲式耳增长到15、16世纪的16蒲式耳（并且这还只是小麦的产量，混合作物的产量就更高了）。每户的播种面积由10英亩上升到15英亩。由于侯先生对每蒲式耳粮食重量的估算较以前有所降低，因而英国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从每年大约产粮115蒲式耳或2280公斤增长到240蒲式耳或4800公斤。

由侯先生的估算方法可知，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关键是单位面积产量以及播种面积的变动，由于15、16世纪户均播种面积的材料极少，在这里笔者只能首先考察单位面积产出的变动趋势，然后结合英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动来考察户均产出的变动趋势。

以上侯先生所说的15、16世纪粮食每英亩产量16蒲式耳是怎么得来的呢？侯先生引用的是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部分），说是“据波梁斯基估算，到16世纪下半叶，小麦每英亩至少达到16蒲式耳，最高达35.4蒲式耳。”[2]但是笔者在波梁斯基的著作中并没有找到这样的叙述。相反，笔者看到的是：“从1466年到1612年每英亩的平均小麦产量从8—8.5蒲式耳增加为11蒲式耳。”“据计算在17世纪期间，小麦每英亩产量从11蒲式耳增加到16蒲式耳。”[3]波梁斯基的估算与当代英国学者坎贝尔（Campbell）和欧弗顿（Overton）的估算很接近。根据欧弗顿前几年的综合估算，如果以1700年英国小麦每英亩年产量（约16.2蒲式耳）为100的话，那么1300年的指数为79（约12.4蒲式耳），1550年为57（约9.0蒲式耳），1600年为72（约11.5蒲式耳），1650年为91（约14.8蒲式耳）。[4]

由于受以科斯敏斯基、波梁斯基为代表的前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在不少人眼里，中古以来的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科斯敏斯基强烈批评了英国剑桥史学家把15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5]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也把都铎王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划入资本主义时代，并对这一时期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过于乐观的描述。这也是少数象布伦纳（Brenner）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大都多少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英国圈地运动描述的影响，认为15、16世纪的英国农业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以及大半个15世纪西欧处于农业衰退的观点，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与马克思的论述有较大差别，因而难以为前苏联史学界所迅速接受也是正常的。侯先生大约也是受了前苏联和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因而对15、16世纪的英国农业生产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当然，在英国也有克里基（Kerridge）这样的极个别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农业革命发生在16、17世纪，而不是在18、19世纪，因为1560—1673年间，英国的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显著进步。[6]但是这种观点毕竟不为英国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所接受，[7]即便是克里基所描述的英国农业生产巨大进步的时间也比侯建新先生所描述的要晚得多。

另一方面，以往，以波斯坦(Postan)、蒂托(J.Z.Titow)、米勒(Edward Miller)、哈切尔(John Hatcher)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根据李嘉图的理论认为，黑死病前夕由于人口增长，导致草地的开垦，从而减少了牲畜的数量，减少了牲畜肥料的来源，最终导致地力下降，导致单位产量下降；由于人口压力，导致劣等地的开垦，从而导致平均单位产量下降。而黑死病后由于人口下降，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劣等地退出耕种；同时草场面积增加，牲畜数量增加，粪肥增多，因而单位面积产量上升。这是一种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式。毫无疑问，他们这种观点是有许多事实根据的。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坎贝尔和欧弗顿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史学家，对于这种观点提出了全面质疑，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周期模式——马尔萨斯—博塞卢普(Boserup)模式。他们认为，在许多地方，也许更为普遍的是，黑死病前夕英国农业生产出现了过密化增长——由于人口压力增大，人均土地减少，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是人均产出减少，人们营养不良，导致黑死病的爆发。黑死病以后，由于人口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减少，产量下降，但是人均产出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改善。随着16世纪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口重新增长，历史又重现了13世纪下半叶、14世纪上半叶黑死病前的一幕：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是人均产出减少，物价上涨，实际工资降低，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在17世纪中期以后几十年，人口陷于停滞状态，单位面积产量也处于徘徊之中，没有显著增长。[8]

根据他们的综合研究，黑死病以后的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初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还下降了，只是随着16世纪以后人口的回升，单位面积产量才逐步回升，一直到17世纪才超过黑死病发生前夕的平均产量。例如在Winchester主教庄园上，显示出了1230—1300年间单位耕地上的劳动日增加了40%，与此相伴随的是单位劳动产量下降37%。相反在1300年到1375年间，单位面积劳动投入下降22%，相伴随的是谷物产量下降37%，单位劳动产出量恢复了19%。在Rimpton这个地方，14世纪伴随人口下降而来的耕地面积缩小与畜群密度增大，粪肥增多，也没有导致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相反由于劳

动投入的减少，产量下降了[9]。在诺福克和肯特北部、东部的许多地方，低产量并没有随中世纪一同结束，从谷物产出来看，许多17世纪的农夫耕种土地也好不到那里去，只有到了18世纪中叶谷物产量平均数与最高数才被决定性地超过。[10]就全国水平而言，直到17世纪中叶，单位面积产量才赶超14世纪初的水平。[11]黑死病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并非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是由于人均耕地、草场面积的扩大，从而在单位面积产出减少的同时，人均产量与收入却得到提高。

15、16世纪的英国农业生产相对于荷兰而言，绝大多数的当代英国学者都认为，直到1600年为止，英国是落后的。[12]17世纪是英国农业赶超荷兰的关键时期。“在1485年亨利七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与法国相比，英国人口稀少，发展缓慢，社会闭塞，它治愈黑死病的侵害的速度比法国、德国、瑞典和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慢些。前工业社会经济复兴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增长过程。”就英国人口的变动而言，“1348年黑死病前夕，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在四、五百万之间，1377年前下降到250万，1525年时英格兰总人口（不包括威尔士）仍然不足226万，这显然表明从黑死病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口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增长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13]由此可见，15、16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并非兴旺发达。

由于侯先生对英国15、16世纪的农业生产先入为主的乐观印象，因而难免对他所看到的材料感到迷惑。由于大量史料表明，13、14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东南部等较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技能及其耕作方式足以同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先进地区并驾齐驱。正如经济史家坎贝尔根据大量史实所做的最新估计：“在那些情况下，领主自用地和农民持有地都保持着持续的高产，而技术与17世纪相比，只有在细节上不同，而本质上已无区别。”“例如，东诺福克在1300年前后休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7%左右，其中一些庄园废止了休耕地，一些地区的小麦每英亩产量晚期的水平。”按照侯先生的想法，既然英国在13、14世纪某些先进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15、16世纪的英国怎么会落后于荷兰与法国呢，17世纪的英国农民干嘛还要去向荷兰学习呢。因而令侯先生奇怪的是，作出上述描述的坎贝尔竟然也认为17、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之前“与欧洲大陆相比，至少落后于低地国家。”[14]

包括坎贝尔在内的英国经济史家们并不否认13、14世纪英国某些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市场发达、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达到了17、18世纪的水平。但他们同时也指出，中世纪农业生产技术的扩散能力很低，[15]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象东诺福克地区那样的生产水平是不多见的。而且，由于黑死病后英国人口的恢复比西欧邻国迟缓得多，[16]因而英国农业生产的恢复也迟缓得多。正如前文所说的，前工业社会经济复兴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增长过程。许多在13、14世纪发展起来的促进单位面积产量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由于人口压力的减轻而被放弃，因为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不如粗放型经营带来的人均产量与收入更高。因而那些技术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相反在低地国家，由于人口恢复增长较早、较快，工商业发达，人口压力大，粮食需求高，导致了较早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恢复与发展，在16、17世纪处于西欧的领先地位，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学习的榜样。[17]以诺福克地区农业生产变动的历程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表明英国农业生产变动的轨迹。

诺福克地区土地肥沃，14世纪初的农业生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生产水平直到四个世纪之后才被决定性地超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诺福克地区人口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市场发达，因而在产量方面与单位面积土地价格方面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处于引人注目的领先地位。在接后的五个世纪中，这种领先地位日益被侵蚀，因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转移了。在16世纪人口恢复增长中，土地单产也一直没有恢复到黑死病以前的水平，1584—1640年间的增长本质上是中世纪生产水平的恢复。那时候土地更稀缺，劳动力更便宜，粮食价格更高了，提供了密集耕作的刺激。中世纪产量的高点黑麦是在1660年代才被超过，然后是燕麦在1680年代被超过，然而大麦和小麦直到1710年以后才被超过。[18]

## 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时间的考察

侯先生认为，到16世纪末叶，英国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人口与人均产量同时增长，并且说是以诺思的有关论述为依据。[19]笔者认为，侯先生其实是误解了诺思的意思。在诺思看来，由于18世纪初英国的实际工资相对于17世纪初，增长了35%，因而17世纪的英国实现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收入也上升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诺思同时也指出，这种转变主要是英国革命完善英国私有产权的结果，是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的成果。英国农业和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6世纪伴

增长出现了大幅下降，1600年的指数大约相当于1500年的40%多一点。诺斯认为，“十六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十六世纪人口的迅速增长，通过农业报酬递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标准。”[20]17世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英国陷入危机之中，实际工资在1600年已经较低的水平上仍然有所下降。直到1650年代英国人口总数从17世纪的高峰停滞与回落的时候，实际工资指数才获得了恢复。只有到1680年代英国人口恢复增长，实际工资也随同增长，这时候的英国才真正开始显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以1700—1749年农业工人实际工资为100，则1500年代为146，1600年代为72，1610—1640年代为64—71，1650—1690年代为75—101。[21]同一时期英格兰人口变动为：1520年226万，1541年277万，1601年410万，但仍然低于黑死病以前的人口高峰，1657年为17世纪最高528万，1686年回落到486万多的新低，1700年回升到近503万，以后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22]

大多数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在十八世纪以前，英国并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呈前近代的周期性变动——马尔萨斯模式与博塞拉普模式同时起作用下的周期性变动。按照马尔萨斯模式，近代以前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随着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人均土地减少，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人口的停滞甚至黑死病那样的人口灾祸。另一方面，按照博塞拉普模式，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压力的增大，人们会开发出更为集约地使用土地的方法，促进技术的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两种效应同时起作用。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均土地减少，人们开发出了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促进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它是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因此人们生活水平下降。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情况则恰恰相反。16至17世纪中叶新一轮增长的模式与黑死病前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尽管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表明，英国农业并没有实现单位面积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加，而且1650年以后英国人口重新处于停滞与下降之中，表明英国还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在十八世纪之前，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往往是以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为代价的。[23]当然，不可否认，英国农业在17世纪获得了巨大进步，成为欧洲最发达的农业，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前半个世纪，单位面积产量有巨大提高，尽管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而在后半个世纪，由于大批小农失去土地，劳均土地面积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停滞不前。

笔者在前文探讨15、16世纪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变化中，只是讨论了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而没有考察单个一般农户的总产出变化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户均播种面积的数目更难准确估算。在此，借助于宏观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比较合适。没有疑问的是，黑死病以后15世纪的一般农户年粮食总产量是增加了，但是不可能增加很多，因为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必须以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为条件，否则农民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粮食。当代英国经济史学界一般认为，15世纪的英国城市处于危机之中，城市化程度相对于黑死病前夕有所下降。至于这一时期的原工业化发展也不可高估，按波斯坦的估计，即使呢绒业最繁荣时，它所能雇佣的最高人口也只有5万人左右，即仅有5—7%乡村小土地持有者和无地者（并非所有土地所有者）被雇佣于呢绒制造业中。[24]而侯先生推算出农户户均年产量增长130%，剩余商品率（除去种子、租税及足量的家庭粮食消费）从15%上升到60%，由于当时英国并不出口粮食，这就意味着非农业人口比率翻了两番，是以前的四倍。这与当时英国城市危机、工商业发展缓慢、非农人口比率增长停滞不前显然是极不相符的。按照欧弗顿的说法，16世纪早期，英国大约80%的农民只能生产出足够他们自己家庭消费需要的粮食，英国大约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25]而且，由于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初的英国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时代，[26]因而欧弗顿的说法就更有意义了。就16世纪英国城市人口比重变化而言，1540年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5%，1600年增加到约8%，如果把城市的标准降低到2500人，那么约70%的城市人口生活于10000人以上的城市，[27]由此可见当时英国中小城市不发达，城市化水平不高。当然，由于当时英国农村工业有较大发展，采煤、制铁、造船与军火工业（这些工业位于城市之外，但不属于原工业化所探讨的农村工业[28]）亦成就不斐，因而非农业人口比率会更高。但是根据英国人口史专家里格利（Wrigley）的估计，英国非农业人口比率只是由1520年的24%（笔者认为，根据前文的探讨，这个数据应该与英国13、14、15世纪的非农人口比率相差不大。有英国学者估计，1300年英国居住于2000人及以上城镇的人口达60万人，占总人口比率的10—15%。[29]）上升到1600年的30%。[30]即便在16世纪英国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其农户生产率的提高，根据欧弗顿的估计，从1520年至1600年农业劳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年生产率）只提高了8%，这也仅仅是根据农业人口比例变化而推算出来的，如果计入16世纪物价上涨，人们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因素，则肯定没有这么多。[31]至于经济全面萧条的15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更加有限了。

因而，根本不可能出现15、16世纪户均农业生产比13、14世纪增长130%的情况。

## 结束语

总的来说，就整个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末的英国而言，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粮食单产下降，但由于农户土地面积增加，因而年产增加，劳动生产率相应也有一定的增加，不过增加不多；15世纪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由于人口停滞，单位产出继续低于黑死病前夕，但是由于土地仍然丰富，普通农民与工资劳动者生活水平相对较好；16世纪随着人口的重新增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主要是黑死病前夕生产水平的恢复，并且尚未超过，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重新减少，户均年产量增加很少，另外大批耕地不足农民与主要靠工资生活的人生活水平恶化了。因而，15、16世纪英国农业年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与侯先生所估算的相对于13、14世纪增长130%相差甚远。一般认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增长主要是在17、18世纪的农业革命时期。侯先生对15、16世纪英国粮食生产的估算与历史实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不仅仅是误差而已。对此我们应当吸取教训是，在估算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免得出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数据还长期不能发觉，十几年来一直沿用，并以此为基础去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整个体系的可靠性。

## 注释：

[1] 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二、七章。侯建新：《封建农民及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4章》，学林出版社，1997年，106—108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济南出版社，2001年，75—77页。在其另一本书《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中相关章节的论述亦是如此。（东方历史学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郭吴新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40、245页。

[4]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7页。

[5] M. 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垚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49页。

[6] Erik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1967, 13、328页。

[7]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5、6页。

[8] M. S. Campbell & Mark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 Present*, Oxford Press, 1993年，第141期，41—42，95—99页。

[9] M. S.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8, 383页

[10] 同上，334页。

[11]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77页。

[12]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初版于1997年），91、232页。

[13]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英文版初版于1984年），39、40页。

[14] B·M·S·坎贝尔：《中世纪英格兰农业的进步》，《经济史评论》（英）1983年2月，第1号。这一段皆转引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73、74页。

[15] M. S.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15页。

[16] 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三章。

[17]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91—96页。

[18] M. S.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第379, 381页。具体数据的变动读者可以参阅M. S. Campbell & Mark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 Present, 1993, 第141期，70页。

[19]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69页。

[20]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垒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九、十二章。

[21]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第64—70页。诺思所描绘的变动曲线也只有极细微的差别。

[22] Wrigley, E. A & Schofield, R. S,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530—535页。

[23] M. S. Campbell & Mark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 Present, 1993, 141期，95—99页。

[24] Postan, M.M,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1981, 227—228页。

[25]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8页。

[26] 黄春高：《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68、169页。

[27] Peter Clark, edit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 154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 197页。

[28]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12页。

[29] R. H. Britnell, "Commer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ngland", 1000-1300, in Britnell and ]Campbell (eds.), Commercialising economy: England 1086 to c. 1300, Manchester, 1995, 10、11页。

[30]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82页。

[31] 同上，121页。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出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9月16日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